

中国法庭如何审判日本战犯(上)

◆ 刘统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战争罪犯展开审判。在南京、北平、广州、上海等10个城市设立了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从1945年12月至1947年12月共审判日本战犯2435人,其中判处死刑149人,实际执行145人(4人在执行前病死或减刑)。其余的判处无期或有期不等的徒刑,少部分无罪释放。

1946年1月19日,同盟国统帅部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又称东条审判)。中国审判作为东京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提供证据,为东京审判作出了重要的配合和贡献。

这场审判,是在英美等国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后,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的独立司法审判。对长期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宣示主权、伸张正义的重大事件。在没有先例、没有经验的背景下,独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国际审判,对中国的司法工作者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公正地说,国民政府诸多外交、法律、军事人员,付出大量的努力,完成了这次规模浩大的审判。

有两个特殊人物不在战犯名单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筹备工作,是在英美盟国的带动下展开的。二战后期,英美等国就在谋划战后如何惩办法西斯罪行。1943年10月,同盟国各国代表在伦敦成立“联合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参加。1944年2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

开始了初期的日军罪行调查工作。

1945年8月15日后,各地日军相继向国民政府投降,等待遣返。国民政府在接收过程中,得以开始实质性的调查和审判战犯工作。

审判的第一项工作,是确认战争罪犯。日本侵略中国早于二战,时限应提前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和华北的日军首领,都应列入战犯名单。1945年9月,国民政府由外交部牵头,会同中央秘书处、司法行政部、军令部、中宣部、国际问题研究所连续召开会议,最初议定的名单有48名,最后议定的日本战犯为20人。蒋介石审定后标出重犯12人:1.土肥原贤二,2.本庄繁,3.谷寿夫,4.桥本欣五郎,5.板垣征四郎,6.矶谷廉介,7.东条英机,8.和知鹰二,9.影佐祯昭,10.酒井隆,11.喜多诚一,12.畑俊六。其余8人为:梅津美治郎,多田骏,秦彦三郎,小矶国昭,大谷光瑞,阿部信行,南次郎,甘粕正彦。最后大谷光瑞、甘粕正彦被排除。

战犯名单中,有两个特殊人物不在其中。一个是日本天皇裕仁。国民政府最初认定的战犯名单,天皇裕仁排在首位。美国为了长久控制日本,考虑保留天皇制度,杜鲁门总统与蒋介石磋商后,将裕仁删除。尽管外界舆论强烈要求追究天皇的罪责,国民政府还是与美国保持了一致。另一个是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是侵华首恶。但日本投降后,冈村积极配合国民政府的接收,使蒋介石感到满意。在商议战犯名单时,何应钦就特别关照: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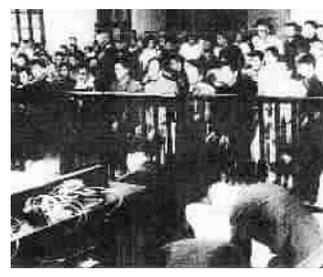
要将冈村列入,以免影响接受日军投降和遣返工作。这就违背了法律的原则,而是出于政治的考虑。

第二项重要工作是定罪。大规模审判日本战犯,需要对罪行有一个全面、合乎法律规则的界定。国民政府在这方面没有经验,先是参照国际法的有关规定,特别是《海牙公约》及《日内瓦红十字会条约》,1946年7月制定了34项罪名。后来考虑到这些罪名未必都符合中国国情,根据中国刑法和战争实际情况,国民政府1946年10月23日公布《关于战犯审判条例》,调整和补充为38项罪名。

从参照国际法设立34项罪名到自主修订的38项罪名,是中国法律界的一个突破:在确认罪行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特别针对日军对国人的大屠杀、虐待、掠夺历史文物等罪行,设立相应条款,对后来的审判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

完成这些基础工作后,1945年11月,国民政府由军令部、军政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行政院秘书处、联合国战犯审查委员会远东分会等单位联合组成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由军令部牵头,开展国内对日战犯的审判工作。在日军遣返之前,国民政府指示各地政府和法院,大量征集调查日本战犯的罪证。

政府颁布的《调查办法》规定:各地方法院检察处和县政府接受群众的申诉报告,并由检察官、审判官直接进行调查取证。调查时要填写统一规格《敌人罪行调查表》,并附带具结文书和证词,使其具有完备的法律效力。



日本战犯在军事法庭上跪地谢罪

但是,调查取证工作并不容易。1947年8月《广东高等法院检察处工作报告书》反映:初期调查工作遇到种种困难。主要原因有:“1.沦陷区人民迁徙频仍,当时被害之人恒多他适。2.被害地区辽阔,各处交通不便,难以普查。3.调查旅费浩繁,表用纸亦多,各地方法院限于经费,颇难措办。”

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广东高等法院动员各地方政府、群众团体和乡镇公所保甲长等负责举报。检察官亲往受害较巨之各区乡村庄,实地调查上报。先后获得12批14567件证据,上报司法部的有5285件。

这个报告具有代表性,可以想见当年调查取证工作的艰辛。尤其是战争罪行的取证最为困难。在战争期间,受害一方很难确认日军的番号、更难以确认日军的身份和姓名。战争期间失踪者下落不明,难以确定生死。施暴的敌军由于调动迁移,异地申诉也很难寻找元凶的下落。所以当年的战争罪行调查不可能将日军罪行全部查清。尽管如此,各地法院和政府还是尽量搜集证据,特别是配合东京审判,取证

工作掀起了一个高潮。这些证据,为后来的审判日本战犯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在广东犯下多起战争罪行的田中久一

根据国民政府和战犯处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1945年12月按军事区域划分,在南京、汉口、广州、沈阳、太原、北平、徐州、上海、济南、台北10个城市设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法庭直属国防部,其余9所分别隶属各地区的最高军事机构。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庭长刘贤年,检察官蔡丽金、吴念祖。

在此之前,各地高等法院已经开始大规模审判汉奸,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相关证据。审判初期,各地法庭的主要目标是日军宪兵、监狱官员。他们在当地作恶多年,民众容易指认。

广州法庭审理的第一案,是驻汕头日军宪兵杀害国民党军队情报人员的案件。1945年7月,汕头日本宪兵吉川悟保、黑木正司等,捕获国民党军186师驻汕头情报主任郭伟杰及属下11人,日军宪兵将这12名国民党情报人员杀害于汕头机场。在法庭上,吉川、黑木等承认了罪行。但汕头宪兵中队长松永平司大尉拒不认罪。声称他当时在广州开会,回来后才知道此事,所以不能承担责任。但同案犯证实:松永早已掌握了郭伟杰等在汕头从事情报工作的线索,指示部下相机行动,所以松永作为宪兵主管,应负首要责任。据此,广州法庭于6月12日宣判,将松永、吉川、黑木三人判处死刑。

援疆日记

闵师林



比计划迟了半小时,车队十点半向莎车方向进发。前往莎车县南部山区。从地图上查看,是往西南,红其拉甫方向,喀喇昆仑山深处。到了达木斯乡。达木斯是驿站之意,位于海拔1900多米,离莎车县城120公里。这个乡里的村民还有居住在海拔3000米高度的山谷里的。莎车县境内最高处也达到了海拔4700米。这个新疆第一大县,80多万人口,遍布在山麓河边。

在达木斯乡见到两只狼狗,被拴着。很暴戾,身轻如燕,据说相当敏捷。这是德国牧羊犬种,是狗类精品,名叫里贝。看着我们就狂吠不止,如猛兽饿虎下山。照相机的闪光灯似乎刺激了它们,暴躁狂怒,充满敌意。可能没感到威胁,才慢慢平静下来,目光神情多了几分散淡。

在达木斯乡党委书记办公室吃的午饭。达木斯的村民住得还挺简陋。走了一家农户,十分破败。心里不太好受。有的村民闻讯赶来。一老翁戴深色毡帽,白色的胡须像板刷一样茂盛,整齐。莎车的何书记以他为是宗教人士,没注意到他回答很坚决:不是的,一个普通人,普通的农民。是县长直接做翻译的。

在莎车境内的叶尔羌河的上游,是乔戈里峰融化的雪水。河水清澈碧蓝,有几处真的湍急奔流,涛声喧响。现是冬季,漫滩地和街地都是石块,有一处街地沉积的细沙是银灰色的,十分细淡。喀喇昆仑山的深处两边山峦蜿蜒,且色彩斑斓,多种矿元素的含量,使得这些山体呈现丰富的色彩,在阳光下十分壮美。阳光直射处,呈灰白色基调,背阴处则灰暗沉郁。

考察了喀拉图孜矿区、隆基水泥厂石灰矿生产基地、达木斯想炮江村的页岩矿山、霍什拉甫乡的石膏矿生产基地、喀什一级水利枢纽、阿斯拉巴格重工业园区和恒昌冶炼、阿斯拉巴格乡阿热灵全村蔬果林示范点、国营二林场精品巴丹姆生产基地,以及托托斯塘乡7村、莎车火车站、教育园区、职业技术实训基地、妇幼保健院和卫生学校。

今天行程300多公里,未作休息,一路颠簸,一路西域风情尽收眼底。

晚上宾馆用餐,自治区卫生厅的一位哈萨克族青年,白净的脸,矮小粗壮的个子,即兴唱起了哈萨克族的爱情歌曲。一点也不拘谨。

2011年1月5日 周三 喀什 乌鲁木齐

昨天碰到深圳援疆的同志,听说深圳支教队的队长(深圳教育部门的一位处长)前些日子病危,急送广东抢救,目前已转危为安。但身体已大为虚弱,恢复工作甚或返喀什,还遥遥无期。深圳对口的塔县,在帕米尔高原上,海拔在3千米以上。这位援友上山下山的,来回奔波,染上了肺气肿,医院开了病危通知。恶劣的自然环境,繁重的工作任务,来自南方的小伙子不适应。援疆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很多后方同志能够理解的。为这位深圳同志祈福,也为全体援疆干部祈福!

上午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统筹资金计划。7500万元的盘子,报了5亿多,谈了大半天,或者很原则,或者很琐碎。有人提出“做硬不做软”,我建议多做硬少做软,但学术之类的活动似不提为妥。项目尽量往示范性、地区性和重点引领性集中。还提了几个具体项目。

匆匆扒了几口饭,草草收拾了行李(后发现少了关键的东西:内裤和袜子),赶到机场,却被告知,飞机刚从乌鲁木齐飞来。至少得延迟一个多小时了。在热而干燥的候机室眯了一会,约半小时,就睡不着坐不住了。翻了一会儿书。六时多,通知上飞机了。八时许到了乌鲁木齐。但到迎宾馆,又足足开了两个小时,路上冰冻溜滑,车开得极其缓慢,车到外环那儿又堵了堵,平均二三十码都不到,堵得心慌、头痛。路上启动的车子排气扇热气汹涌,窗井盖也冒出袅袅热雾。来接我们的浦发银行负责人说,是家家户户排出的废水,直接排入污水管,因此热气腾腾的。车上的温度计显示,室外温度为零下28摄氏度。啧啧!平生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冷的地方居住。

北疆这几天因为西伯利亚南下的强冷空气影响,入冬以来最强的寒潮袭击了北疆多地。乌鲁木齐昨天达到了-28.1℃,创22年来历史最低。富蕴县吐尔洪乡气温跌至-49℃。如此寒冷的天气,在外面一会儿就浑身透凉,手脚麻木,鼻子耳朵都快冻掉了。很多乌市人决定轻易不出门了。当地晚报刊登市民的网话。一个叫“人冷心不冷”的网友说:“等了25分钟的出租车后,我可怜的深圳朋友,她哭了。”(5)

15.怎么确保夺得一块铜牌呢

如果说世界杯是小试牛刀,那么1992年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对于男队来说就是大考。鉴于男队的实际情况,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国家体委下达的任务是进前八。蔡振华想,应该争取进前三名,超额完成任务。

雄心要有现实基础,怎么确保夺得一块铜牌呢?单打有可能吗?蔡振华清楚,只有一号主力马文革才有夺牌的实力。但与他水平相近的外国选手不下十人,拼杀起来马文革将是孤军作战,困难较大。这个险冒不得,如失手不仅辜负祖国人民厚望,对全队刚刚恢复的自信心也会形成致命打击。

那么双打呢?蔡振华心头一动:王涛、吕林这对双打曾在第41届世乒赛上拿下过亚军。他们一左手握拍一右手握拍,是双打的最佳搭配,不会因顺撇而增加两人身体位置躲闪的难度。他们有大赛经验,这一点十分重要。看看对手情况,他知道世界各国对双打不像对单打那么重视,配对有时是临时拼凑,技战术研究

也不像单打那么深入,训练投入的时间比例也较少,可算是单项比赛中的薄弱环节。他拿起一张纸,写下一串双打好手的名字:南朝鲜——刘南奎/金泽洙;德国——罗斯科普夫/费茨纳尔;南斯拉夫——卢普莱斯库/普利莫拉茨;瑞典——瓦尔内尔/阿佩伊伦;林德/皮特卡松。如果讲实力,王涛/吕林和他们差不多。如果把双打作为重点先行一步,把双打的战略意识、训练方法、技术要求研究透,机会肯定多于单打,也可能做回乱世英雄!堡垒往往要从薄弱地方攻克,双打就是单项比赛中的突破口!

善于逆向思维和不拘一格的蔡振华顿觉柳暗花明。蔡振华把自己的想法在教练组私下展开讨论,大家畅所欲言,讲了一些不同看法:一、备战奥运会的重点不放在单打上,是否有点缺少雄心壮志?因为男单是单项比赛中分量最重的。把双打当作突破口,是否有避重就轻之嫌?二、双打马文革不行,男队内拿过名次的只有王涛、吕林这一对,王涛单打曾在全国和一些一般国际比赛中拿过冠军,进攻凶狠可以顶一阵,吕林的单打水平就

不敢恭维了,他们能担起奥运夺牌的重任吗?

第一个分歧很快就统一了。徐寅生与李富荣也支持选双打作为突破口。吕林能否重用?这是一个关系全局胜负的要害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蔡振华也做了“功课”。1989年他回国后,就成为吕林的主管教练,因而对吕林的情况十分了解。他去找吕林谈心,看似无意,实则是摸底。当话题转到奥运会比赛时,蔡振华问道:“你对奥运会比赛有什么想法?”吕林说:“我对双打进前三名还是有信心的。我跟王涛配,发挥好了,冲击冠军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蔡振华听了很高兴。

1967年出生的王涛,是个乐观活泼且有坚强意志的选手。从十七岁开始,王涛涉足国际比赛,团体冠军、单打冠军、男双冠军、混双冠军都有斩获,特别突出的是在第41届世乒赛上,在男队打得哀鸿遍野时,他和刘伟搭档夺取了混双冠军,和吕林搭档获得男双亚军。1991年他随队出征,夺取了第2届世界杯男团冠军。无论实力、素质还是大赛经验,他都是队里最优秀的双打选手。

巴塞罗那奥运会乒乓球双打决赛所在的体育馆,瞬间成了沸腾的海洋,德国球迷们用各种方式为他们的双打选手罗斯科普夫/费茨纳尔加油鼓劲。眼下他们与王涛、吕林这对中国选手的激战打到了20:15,眼看就要拿下第一局。挡板外的蔡振华神色凝重,他盯着王涛和吕林盘算着。大赛的喧闹氛围他不担心,因为在集训时训练场天天放喇叭,用敲锣打鼓声、喝彩声和嘈杂的录音带干扰队员,为的是让他们适应赛场上的氛围。他们还曾玩过一种叫“加棒”的游戏,就是队员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为了增加紧张度,规定胜奖罚输。“发10个不出台的球,出台一个罚10元。”这一来队员们呼啦啦一围上来,有人叫好,有人起哄,还有凑热闹押宝的,仿佛是世界大赛双方打成20平的氛围。有人往球台前一站手就抖,还有人第二个球就发出了台。而吕林不管别人怎么起哄,都如入无人之境,两次都得第一,显示了非凡的定力。所以他和王涛不会因赛场的嘈杂氛围而受干扰。但今天一早参赛前的险情倒是对他们产生了一些影响。

乒乓中国梦



李玲修 王鼎华

走进蔡振华团队